

讀《孝通》論

〔香港〕 宋小莊 著

孝壽說

庚戌新秋兩市子爲其

母氏小菴壽徵信辭焉

香港人民出版社

(滇) 新登字01号

封面设计：徐 芸

责任编辑：乃 东

封面题字：杨 军

读《读通鉴论》

[香港] 宋小庄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地震局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375 字数：310000
1991 年 9月第1版 1991 年 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222-00679-6/B·57 定价：4.90元

序

唐人刘知几著《史通》^①，以为治史者须兼有三长：识、才、学，其中以史识尤为重要。所谓史识，一般指治史者对史的评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②。通过论史可以达到思往事，知来者的境地，为现实提供借鉴并把握未来。王船山是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其身处封建社会走向衰败，资本主义萌芽生而又灭的历史阶段，对封建政治腐败的憎恶，对未来的憧憬及明亡之痛，使王船山的思想自然有别于以往的封建史家，对史的见解，在封建社会中也就不具一格。王船山的史识集中地反映在其所著《读通鉴论》中。有清一代，王船山的著述由于其先进的思想与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倍受冷遇，但二百年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兴起时，王船山的思想及史识则倍受维新变法者之推崇，可见其学说的生命力。对这样一位思想家的史学观点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这种研究不仅有助于科学地总结以往的历史，推动学术的发展，而且有助于人们以史为戒，把握兴替的规律，从而更有效地利用时机，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宋小庄博士所作《读〈读通鉴论〉》正是这样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王船山史识方面的专著。作者对王船山史识方面资料之收集用功颇深，通过对《读通鉴论》的分析，将王船山之论史著作九百余篇汇集一处，并作了分类处理，完整地再现了王船山的史学观，并通过对王船山史识的研究，深入到对其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伦理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等各方面的研究，由点到面，由浅到深，引人入胜。既有深度，

又有广度和很高的可读性。作者在系统地论证王船山思想的同时,不免将自己的史识也反映于书中,认为治史者不仅必须熟知史实,而且应全面系统地认识历史,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这种见解也非一般治史者所能及,实难能可贵。是为序。

张国华 1991年4月

①《新唐书·刘知几传》

②《贞观政要》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历史认识论	(10)
第一节 史 鉴	(10)
第二节 史 识	(19)
第三节 史 德	(26)
第三章 历史方法论	(34)
第一节 因果法	(34)
第二节 比较法	(41)
第三节 考辨法	(48)
第四节 演绎法	(57)
第五节 归纳法	(60)
第四章 历史观	(70)
第一节 进化史观	(71)
第二节 治乱分合史观	(78)
第三节 天理史观	(91)
第四节 圣贤英雄史观	(103)
第五节 民本史观	(111)
第五章 政治思想	(126)
第一节 国家政权	(127)
第二节 治 道	(138)
第三节 人才观	(152)
第四节 任官制度	(161)
第五节 朝政的延续	(175)
第六节 朝政的危害因素	(183)

第六章 军事思想	(205)
第一节 军 权.....	(205)
第二节 治 军.....	(213)
第三节 兵 制.....	(219)
第四节 兵 略.....	(228)
第七章 民族思想	(245)
第一节 夷夏之防.....	(245)
第二节 民族操守.....	(253)
第三节 治夷之策.....	(262)
第八章 伦理思想	(272)
第一节 伦理教育的社会功能.....	(273)
第二节 君臣父子关系.....	(284)
第三节 批判小人.....	(294)
第四节 思想修养.....	(297)
第五节 生死观.....	(309)
第九章 经济思想	(321)
第一节 土地思想和农业政策.....	(322)
第二节 商业和货币政策.....	(331)
第三节 税收财政政策.....	(339)
第十章 法律思想	(349)
第一节 法律的社会功用.....	(349)
第二节 刑罚和量刑.....	(355)
第三节 用法用人和治吏.....	(365)
第十一章 结语	(377)

第一章 引言

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船山，湖南衡阳人。他早年既参加科举，又关心时局，曾加入“行社”、“匡社”、“须盟”等结社。1643年，张献忠部驻衡州时，曾执其父招往，他乃自刺重创，父子俱得释。1644年，明亡，他作悲愤诗一百韵，后南明各朝亡，他皆作悲愤诗一百韵。1648年，清兵入湘，他在衡山举兵抗清失败。1650年，他投奔南明永历朝，任行人司行人，因弹劾权奸，几陷大狱，幸得农军领袖营救脱险。随后辗转返湘山区流亡多年。王船山中岁后隐居衡阳近郊，发愤著书凡四十年。他的主要著作有《周易内传》《周易外传》、《老子衍》、《黄书》、《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诗广传》、《庄子通》、《庄子解》、《相宗络索》、《楚辞通释》、《俟解》、《思问录》、《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和《宋论》等书。^[1] 他的哲学思想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的史学、文学、政治、伦理、教育、经济、法律等思想在我国史学史、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政治思想史、伦理思想史、教育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法律思想史等方面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读通鉴论》是王船山晚年的史论著作。^[2] 金陵版《船山遗书》刊行前，只有乾隆年间衡阳王嘉恺抄本和乾、嘉年间衡阳莫氏抄本存世。^[3] 清初，王船山的史论著作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评宋之书，《四库总目》收刘定之《宋论》、而未录王船

山《宋论》；评通鉴之书，《四库总目》收王应麟《通鉴答问》，亦未录王船山《读通鉴论》。其原因虽可能是四库开馆未及见，^[4]但也可能是王船山书中强烈的民族思想，触犯了清廷的忌讳。同治年间金陵版遗书刊行后，《读通鉴论》才得以有所传播。^[5]然在有清一代，《读通鉴论》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满清末造，政府腐败，列强入侵，社会动乱，志节之士，先知先觉。不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莫不试图从近代西方或古代中国寻找精神力量。明末清初诸儒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实践，才引起广泛的注意，王船山自在其内，这是同治年间刊刻《船山遗书》的曾氏兄弟始料不及的。梁启超说得好：

“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像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他们反抗满州的壮烈行为和言论，……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6]

在清初诸儒之中，王船山的思想影响尤大。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于张横渠正蒙及王船山遗书皆刻意讲求”、谭氏治学亦“专主船山遗书”。^[7]谭嗣同认为“国初三大儒，唯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8]又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9]敬慕之情，溢于言表。

章太炎也着重推崇王船山。他说：“季明之遗老，惟王而农为最清。”^[10]他在《重刻船山遗书序》指出：“当清之季，卓然能兴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矣。”他强调王船山民族思想的作用说：“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之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展。”^[11]章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主旨亦即王船山提倡的不以一时君臣之大义，废古今夷夏之通义的主张。^[12]

对于《读通鉴论》，晚清学者却有不同意见。梁启超认为“《读通鉴论》、《宋论》往往有新解，为近代学者所诵习，尤能

为深沉之思以掸绎名理”。^[13]他又指出王船山的撰述特点云：

“他有他的一贯精神，借史事来发表。他有他的特别眼光，立论往往迥异流俗。所以这两部书可以说是有主义、有组织的书……。攘夷排满是里头主义之一种，所以给晚清青年的刺激极大。”^[14]

可惜他又说：“这两部自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但在史评一类书里，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15]这未免是自相矛盾。有一贯精神、有特别眼光、有主义、有组织，有影响的书没有理由不列为第一等。不但在史评类著作是这样，在王船山的全部著作中也是如此。

严复一方面认为王船山有独造之论，另一方面，又断言所然者甚少。他指出：“王夫之为之通鉴论也，其中有独造之言焉。其论东晋蔡谟驳止庾亮经略中原之议也^[16]，谓谟、绰、羲之诸子无异南宋之汪、黄、秦、汤，同受名教之诛也。”^[17]但他又说：“王夫之之为通鉴论也，吾之所谓然，二三策而已。”^[18]《读通鉴论》计有九百余篇史论，所论史事所提策略数以千计，其中只有二、三策值得称道，这是难以使人信服的。严复早岁致力西方文化，反对中国传统学术，他有此类论调，也是不足为奇的。

辛亥革命后，研究王船山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估计研究人员在百人以上，论著在千种以上。在船山遗书中《读通鉴论》是被最广泛征引的一部书。但是，全面地研究《读通鉴论》还是比较少见的。^[19]因此，对它进行研究，完整地揭示其思想体系和内容，仍具学术上的必要性。

研究《读通鉴论》不仅对研究其本身有意义，而且对深入分析《资治通鉴》的内容，对综合理解我国史论的成就，对合理评价王船山的思想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记述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3年)，下至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一千

三百六十三年的历史。〔20〕对于通鉴，历代皆有好评。宋神宗、朱熹、胡三省、胡应麟、四库全书、王鸣盛、梁启超以及近人岑仲勉、钱穆等人都曾给通鉴很高的评价。

自通鉴问世以后，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从学人员不可胜数。研究通鉴的方向大致可归纳为六个。一、考究始末，探讨编修；二、训诂注释，了解内容；三、前继后续，延长断限；四、体例改编，创新形式；五、修订指误，补正疵漏；六、论断史事，经世致用。〔21〕到了近代，有按各专题研究通鉴的倾向。近十数年，又有使通鉴语体化的发展。通鉴学作为一门学问有继续普及和深入提高的趋势。司马光倡导的从通鉴史事取鉴、资治的主导方向始终没有改变。

评断通鉴史事以求资治始于司马光本人，散附在通鉴史事之后的史论计有二百一十八篇，其中“臣光曰”一百一十九篇，司马光引司马迁、班固等三十三家史论九十九篇。后来，张拭《通鉴论纂》、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张溥《历代史论》、朱权《通鉴博议》等也都是。但从系统的完备、见解的卓越而言，都比不上王船山《读通鉴论》。〔22〕参合《资治通鉴》和《读通鉴论》的研究，可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起刘知几《史通·论赞》所说“辨疑惑，释凝滞”的作用。

长期以来，世界史的研究有以西方为中心的倾向。不但在近代史上把西欧视为时代中心，而且在上古史、中古史上也以西欧为评断标准，中国史至今仍未得到西方史家的应有注意。西方史家经常对我国史学进行不恰当的指责，他们攻击我国史学只是史料学，其中只有史料编纂，而没有历史批评。〔23〕

此类指责，不足为训。我国史论可分两类，正如梁启超所说：“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批评史书者”。〔24〕但是梁启超自己对我国史论也有一些误解，一是说“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25〕二是说“无论如何警拔，总易导读者入于

奋臆空谈一格，故善学者弗尚焉。”〔26〕

其实，我国很早就把史论视为学术门类。《昭明文选》分目已有史论，选收《汉书》、《后汉书》、《宋书》之论赞等九篇。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史目共分十三类，其中便有史评类，清官修《四库全书》、张之洞《书目答问》亦按此分目。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唐刘知几《史通》、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等书，都是评论史书的专著。我国史论渊源流长，并非始于近代，更非由西方传入。

至于梁启超批评我国史论“奋臆空谈”之说是承续郑樵《通志》废止“论曰”、“赞曰”的主张，沿袭毕沅《续资治通鉴》不作论赞的做法，附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八《史部·史评类序》批评史论的意见，尚不足以代表我国史家评价史论的主流。

我国史论作为论赞类史体，始创于编年体《左传》的“君子曰”，而得大成于纪传体《史记》的“太史公曰”。〔27〕但是我国论断史事的史论，其起源更早。我国的经书、子书都有极丰富的历史解释内容。〔28〕论赞类史体确立后，我国主要的编年体、纪传体史书基本上都把论赞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份，采论赞形式的单篇论文亦不少。我国史家的史学观点从史论得到充分的体现。有些史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并不能全盘否定史论本身的价值。

必须指出，在我国史论中，王船山《读通鉴论》是很突出的。在王船山的著述中，《读通鉴论》也是很有特色的。王船山的大部份著述采用为儒家经典注疏的方式表达意见，使他不免受到原经典思维形式、概念、命题乃至用词的束缚，在某种意义上是思辨的产物。而《读通鉴论》的论述却有所区别。王船山把握朝代兴衰、事件发生和人物作用，探索其规律，辨析其因果，评估其功过，论断其是非，给予理论的概括，在上下

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的领域里，充份展示极其活跃的思维、卓越的才识和坚贞的操守。《读通鉴论》可以说是我国史论的代表作，是我国传统史论高度发展的反映。

王船山具有高度的智慧、深博的学识、旺盛的写作热忱。他无疑是明末清初多产的思想家，他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体裁撰写的著作达一百余种、四百余卷、八百余万字。他的史论著作也十分丰富，除《读通鉴论》、《宋论》外，《尚书引义》、《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诗广传》、《四书训议》、《读四书大全说》等书寓史于说经，《黄书》、《俟解》、《噩梦》、《思问录》等书涉史以论世，散见于他书的史论也不少。

丰盛的著述带来全面深入研究的困难。前人的研究往往各取所需，设论立说，援彼证此，自圆其理，出现了许多彼此对立的说法，造成了研究工作的混乱。仅以王船山学术渊源而论，就有种种说法。例如：王敌说：“参伍于濂洛关闽”。〔29〕余廷灿说：“原本渊源，神契张子。”〔30〕唐鉴说：“为学由关而洛而闽，……宗程朱”。〔31〕邓显鹤说：“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而源本渊源尤在正蒙一书。”〔32〕清史稿说：“推本阴阳法家之原。”〔33〕刘毓崧说：“前哲名儒自刘子政以下，皆肆意攻击”。〔34〕王闿运说：“总其成书，亦杂家者流。”〔35〕梁启超说：“王学反动所产人物”。〔36〕又说：“生于南荒，学无所师承。”〔37〕张西堂说：“原本渊源，固在张子，得之于易、春秋亦甚深，……又受道佛两家学说之影响，……又与邹东廓、邹泗山有关系，……于明儒之学，亦当不无涉览。”〔38〕嵇文甫则认为与张横渠、东林派、庄释各家、晚明考证和质测之学，都有关系。〔39〕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每一种说法都有相当的证据，但也有一定的破绽。〔40〕

仅仅王船山学术渊源已有上述尚未穷尽的不同看法，有关

王船山思想本身的研究分歧更多。〔41〕这不仅显示研究方法的差异,而且说明材料取舍的任性。本文专注足以代表王船山晚年的一部著作,希可避免任意取舍材料的毛病。

《读通鉴论》共三十卷,约八十余万字。每卷以朝代为别,各朝又以帝号为目,唯三国与五代各自成目,不分帝号,总计八十五目。每目少则一篇,如晋简文帝、宋前废帝、宋顺帝、陈临海王、唐顺宗等目;多则数十篇,如汉光武帝一目达三十八篇,五代一目更多至六十五篇;其余各目篇数不等;卷末另有叙论四篇,全书总共九百一十二论。〔42〕从化整为零而言,《读通鉴论》是王船山读史有感,随事触发,浮想联翩,下笔成文;从聚散而合来看,各单篇自有内在的凝聚力,王船山无意成一系统而结果却可自成体系。

《读通鉴论》主要以通鉴所载史事为背景论述,部份以“臣光曰”和司马光所引其他史家的论赞为对象评析。上自秦始皇,下迄五代,偶兼三代、春秋战国及宋元明史事。对我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民族、伦理、经济、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全面而精湛的剖析,同时也完整而深入地阐明了作者的历史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

本文试图通过研究《读通鉴论》,把它分散的、针对个别史实发论的九百余篇史论有机地归类、分析、综合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作为研究《资治通鉴》、研究我国史论,研究王船山思想的参考。

〔1〕 对王船山的生平,可参看张西堂《王船山学谱》,许冠三《船山学术思想生命年谱》,肖麓父《王夫之年表》等书,此不赘。

〔2〕 王致《姜斋公行述》云:“末年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

- [3] 据刘志盛《王船山著作传本知见录》，中国哲学第十辑。
- [4] 据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四库开馆于乾隆三十七年下诏求遗书，四库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倘《读通鉴论》抄本晚于此时，四库可能未及见。
- [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七》云：“自将《船山遗书》刻成之后，一般社会所最受欢迎的是他的《读通鉴论》与《宋论》。”
- [6]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四》
- [7] 邓谭州《谭嗣同传论·一》
- [8] 谭嗣同《上欧阳瓣龠书二十二》
- [9] 谭嗣同《仁学》卷上，亦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引言。
- [10] 章炳麟《说林·衡三老》，民报第九号。
- [11] 章炳麟《演说录》，民报第六号。
- [12] 参《读通鉴论》卷十四东晋安帝（十四）。括号内的十四指王船山论晋安帝朝史事的第十四篇史论，下同。
- [1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六》。
- [1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七》。
- [15] 同上。
- [16] 蔡谟驳止庾亮经略中原之议见《资治通鉴》卷九十六晋成帝咸康五年，王船山之论见《读通鉴论》卷十三东晋成帝（十四）。
- [17] 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第五卷第十四章按语。
- [18] 同上。严复在此模仿《孟子》第四十九章所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流杵也？”但孟子所言为是，严则过甚其辞。
- [19] 可参考林纾《评选王船山史论》，胡思敬《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嵇文甫《王船山史论选评》，李增财《从读通鉴论、宋论浅窥王船山的思想》，黄明同、吕锡深《王船山历史观与史论研究》，李季平《王夫之与读通鉴论》等数种。
- [20] 与司马光所记有出入，司马光《进通鉴表》云：“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 [21] 有关文献可参看张熙侯《通鉴学》、刘乃和、宋衍申主编《资治通鉴丛论》
- [22] 可参看吕锡琛《王夫之与司马光以史资治思想之比较》、湘潭师专学报1982年二期，亦见《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集》：施丁《王夫之对司马光史论的批评》史学史研究1987年二期等文。

- [23] 可参看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该书把西方史家分为正统史家、非正统史家和汉学家三类，罗列了他们谈我国史学的种种谬论，从中可大致了解七十年代以前他们对我国史学的低劣的研究和流畅的英文。
- [2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 [25] 同上。
- [26] 同上。
- [27] 可参看张大可《史记论赞辑释》。
- [28] 可参看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等书。
- [29] 王敌《姜斋公行述》。
- [30] 余廷灿《船山先生传》。
- [31] 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三。
- [32] 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
- [33] 《清史稿·王夫之传》。
- [34] 刘毓崧《尚书引义跋》。
- [35] 王闿运《衡阳县志、艺文志》。
- [36]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3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六》。
- [38] 张堂西《王船山学谱》第二章。
- [39] 嵇文甫《王船山学术论丛》。
- [40] 陆复初在《王船山学案》中提出王船山思想三个来源。一是源本六经，旁罗诸子；二是接受我国渊源流长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尤其是王充和张载；三是扬弃佛老和程、朱、陆、王的正宗理学。这是比较全面的提法。
- [41] 仅以二次大型的有关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会的情形而言，足以说明。
- [42] 据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读通鉴论》编校后记。岳麓书社1988年6月出版。《读通鉴论》版本甚多，本书引自该书，九百一十二篇均有征引，希可避免片面性。

第二章 历史认识论

王船山的历史认识论可概括为：一、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二、对史事观察、分析、表述能力的认识；三、对史家职业操守的认识。这三者，以我国传统史学的术语而言，就是史鉴、史识和史德。

论史一般离不开上述三要素。本文把治史的才、学、识三长归纳成一个“识”字，与传统的提法有所不同，主要是因为“识”是“才”、“学”的表徵，有才、学未必有识，而有识可自有才、有学。至于史鉴与史德，与传统的说法是一致的。

第一节 史 鉴

一、论史目的

《资治通鉴》卷三十九汉淮阳王更始元年载刘秀徇河北言，陆续接受铜马、刘茂、朱鲋、檀乡、五校、孙登、青犊、延岑、张邯刘、永、张步等降兵数百万。处置安抚降兵若失当，必然要给即将建立的东汉社会带来严重动乱，其因在于“民欲动而难静，而乱世之民为甚”。^[1]“而光武处之也不十年而天下晏然，此必有大用存焉”。^[2]王船山指出：“盖先后所受降者，指穷于数。战胜矣，威立矣，乃几千万不逞之徒，听我羈络，……高帝之兴也，恒患寡而亟夺人之军，光武则兵有余而抚

之也不易”。〔3〕他由此断言：“此光武之天下，所以难于高帝也”。〔4〕“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前而高帝，后而唐、宋，皆未有如光武之世，胥天下以称兵，数盈千万者也”。〔5〕

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遗憾的是：“史不详其所以安辑而镇抚之者何若，则班固、荀悦徒为藻悦之文、而无意于天下之大略也”。〔6〕有感于此，他提出历史为来者师的明确要求：“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7〕

王船山一方面批评不求资治的撰述，另一方面赞扬以史为鉴的宗旨。他欣赏《资治通鉴》一书的命名为“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8〕他逐字解释“资治通鉴”四字的含意。对于“资治”，他强调变通致用的必要性说：

“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已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9〕

对于“通鉴”，他强调普遍适用的重要性说：“其曰通者，……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10〕他又指出：“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11〕他借解释“资治通鉴”四字阐述以史经世致用的观点。